

魏晋南北朝汉译佛经语言研究丛书

姚秦译经助词 研究

◎ 主编 蒋冀骋



龙国富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姚秦译经助词研究

◎ 主编 蒋冀聘

龙国富 著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姚秦译经助词研究 / 龙国富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9

(魏晋南北朝汉译佛经语言研究丛书)

ISBN 7-81081-450-8

I. 姚... II. 龙... III. 佛经—助词—研究 IV. 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6266 号

姚秦译经助词研究

龙国富 著

◇丛书主编: 蒋冀骋

◇责任编辑: 刘苏华

◇责任校对: 刘琼琳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8853867 8872751 传真/0731.8872636

网址/www.hunnu.edu.cn/press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 670×960 1/16

◇印张: 20.25

◇字数: 330千字

◇版次: 2004年9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书号: ISBN 7-81081-450-8/B·013

◇定价: 40.00元

《魏晋南北朝汉译佛经语言研究丛书》

总序

魏晋南北朝汉译佛经以其较强的口语性而受到汉语史研究者的重视，利用它，可以作如下几方面的研究：

1. 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音。汉译佛经中有大量梵汉对音材料，而这些对音材料正是当时语音的较客观的记录，比较接近口语，利用它来研究当时的语音，应该更接近语音实际。在这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国内学者有俞敏、刘广和、尉迟治平、李维琦、施向东、张福平、储泰松诸先生。由于受梵文语言系统的限制，这种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梵文齿音只有一套，而汉语有三套，用梵文的一套齿音分别对音汉语的三套齿音，就难以反映语音实际了。故利用对音材料要注意所对译语言的语音系统性。

2. 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口语词汇。翻译过来的佛经是要对百姓宣讲的，为达此目的，翻译者要尽可能使用当时人们的口语，而尽可能避免使用文言。这就为后来的语言研究者留下了大批珍贵的当时口语材料。利用这批材料研究当时的口语，成了汉语史研究者的任务，在这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国内学者有朱庆之、李维琦等先生。朱庆之重宏观研究和框架构建，同时也有较精当的微观考释，所谓微观、宏观相结合者也。李维琦则重“字面普通而义别”的微观考释，多有创获。此外，蒋礼鸿、郭在贻、项楚、江蓝生、方一新诸家的研究中，也大量使用过魏晋南北朝汉译佛经的材料，也多有成就，但不是对汉译佛经的专门研究，故不在此列。新词新义的研究，李维琦的成就堪为榜首，但常用词的研究，还有大量工作可做。

3. 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法。汉译佛典的口语

性，既为词汇研究提供了材料，也为语法研究提供了材料。语法的变化，在正统的文言文里比较缓慢。由于仿古的原因，文言文的语法在某种程度上难以代表当时的口语语法，所以研究语法必须以口语性较强的材料作为研究对象。在这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国内学者有高名凯、刘世儒、王力、吕叔湘、刘坚、蒋绍愚、江蓝生。此外，一批年轻的学者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曹广顺、吴福祥、胡敕瑞、龙国富、唐贤清、陈秀兰诸君都有著作问世，是其代表。

4. 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俗字。汉译佛经中有大量俗字，为汉语俗字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在这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较大贡献的国内学者有潘重规、张涌泉、郑贤章等。

汉译佛经材料对汉语史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有鉴于此，本学科带头人李维琦教授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即着力于魏晋南北朝汉译佛经的语言研究，历时十余载，成《佛经释词》、《佛经续释词》二篇，为本学科在魏晋南北朝汉译佛经的语言研究方面取得有利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他的学生蒋冀骋率博士生郑贤章、龙国富等对汉译佛经的语法、俗字进行了研究，也略有收获。今裒而集之，成《魏晋南北朝汉译佛经语言研究丛书》，以飨学者，以就正于方家。

人生有限，学海无涯。若能以有限的人生在无涯的学海中采撷得一二珠粒，也算不“枉入红尘若许年”了。纵使无所采撷，只要在学海中游过泳过，也算不虚此行了。结果固然重要，过程又岂可轻视？

是为序。

蒋冀骋

于湖南师范大学无知斋

2004 年 8 月 19 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姚秦译经中的诸语法现象	(1)
一、引言	(1)
二、姚秦译经的数量、年代及真实性	(3)
三、姚秦译经中的诸语法现象	(5)
第二节 姚秦译经在汉语史中的价值	(36)
一、新的虚词和新的格式多有出现	(36)
二、为语法现象确切的时间提供材料	(41)
三、在汉语语法史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44)
第二章 形成中的动态助词	(48)
第一节 概 论	(48)
一、汉语动态助词产生的原因	(48)
二、上古汉语完成态的表达方式	(49)
三、近代汉语动态助词的发展	(49)
第二节 形成中的动态助词“将”和“得”	(50)
一、姚秦译经“将”字的用法	(50)
二、姚秦译经“得”字的用法	(52)
第三节 形成中的动态助词“却”	(54)
一、“却”字的用法及其句法环境	(54)
二、中古时期“却”字的虚化程度	(62)
第四节 形成中的动态助词“著”	(64)
一、姚秦译经“著”字的用法	(64)
二、唐代动态助词“著”字的发展	(68)
三、动态助词“著”字的产生	(69)
四、“贪+著”类结构的来源	(71)
第五节 表完成貌的“已”	(74)
一、表完成貌“已”字的用法	(74)
二、表完成貌“已”字的来源	(77)

三、完成貌“已”字的性质及影响	(80)
四、动态助词小结	(83)
第三章 结构助词	(85)
第一节 概 论	(85)
一、上古汉语结构助词的特点	(85)
二、近代汉语结构助词的特点	(85)
第二节 结构助词“之者”和“者”	(86)
一、结构助词“之者”的用法	(87)
二、结构助词“者”的用法	(88)
第三节 领属助词“许”和“所”	(89)
一、领属助词“许”、“所”的用法	(89)
二、领属助词“所”、“许”的演变途径	(93)
三、领属助词“所”、“许”的语法化	(99)
四、领属助词“许”产生的前提条件	(104)
五、领属助词“许”的来源	(107)
第四节 表等同和估量的“许”	(109)
一、等同与估量助词“许”的用法	(109)
二、等同助词“许”的语法化途径	(112)
三、“许”演变为等同助词的句法环境	(114)
四、结构助词小结	(116)
第四章 语气助词(一)	(118)
第一节 概 论	(118)
一、上古汉语语气助词的特点	(118)
二、近代汉语语气助词的特点	(119)
第二节 假设语气助词“也”和“者”	(120)
一、假设语气助词“也”的用法	(120)
二、假设语气助词“者”的用法	(122)
第三节 假设语气助词“时”	(129)
一、假设语气助词“时”的用法	(129)
二、假设语气助词“时”的最早时间	(133)
三、假设语气助词“时”的来源	(134)
四、“时”虚化的句法环境和语义条件	(135)
五、“时”的语法化机制	(136)
六、“时”的语法化动因	(138)

七、“时”在译经以后的发展演变	(139)
第四节 判断语气助词“也”	(142)
一、引言	(142)
二、判断语气助词“也”的用法	(143)
三、判断语气助词“也”减少的原因	(145)
第五章 语气助词(二)	(152)
第一节 趋于衰落的“耳”、“焉”和“哉”	(152)
一、语气助词“耳”的用法	(152)
二、语气助词“焉”的用法	(156)
三、语气助词“哉”的用法	(160)
第二节 表新情况出现的“也”	(161)
一、表新情况出现的“也”的用法	(161)
二、表新情况出现的“也”产生的原因	(163)
三、表新情况出现的“也”的演变	(164)
第三节 表新情况出现的“矣”	(169)
一、表新情况出现的“矣”的用法	(170)
二、与上古比较看“矣”字的特点	(171)
第六章 语气助词(三)	(174)
第一节 疑问语调词“也”	(174)
第二节 疑问语气助词“耶”	(177)
一、疑问语气助词“耶”的用法	(177)
二、“耶”新产生的两种格式	(182)
三、“耶”作“也”的用法	(185)
第三节 疑问语气助词“乎”	(186)
一、疑问语气助词“乎”字的用法	(186)
二、与上古比较看“乎”字的特点	(188)
三、“乎”字消亡的原因	(190)
第四节 疑问语气助词“尔”	(192)
一、引言	(192)
二、疑问语气助词“尔”的用法	(192)
三、疑问语气助词“尔”的来源	(194)
四、从“尔”到“呢”的合理解释	(195)
第五节 疑问语气助词“那”	(201)
一、引言	(201)

二、疑问语气助词“那”的用法	(201)
三、疑问语气助词“那”的发展演变	(205)
四、关于“那”、“耶”异文的解释	(211)
第七章 语气助词(四)	(215)
第一节 疑问句末尾的“为”	(215)
一、疑问句末尾“为”的用法	(215)
二、疑问句末尾“为”的语法化途径	(218)
三、疑问句末尾“为”的语法化动因	(222)
四、疑问句末尾“为”的语法化机制	(224)
第二节 疑问句末尾的“不”	(225)
一、疑问句末尾的“不”字的用法	(226)
二、从上古汉语看译经“不”字的特点	(230)
三、关于姚秦译经“不”字的虚化问题	(232)
四、唐宋“不”字的演变	(237)
五、疑问语气助词“不”的产生	(240)
六、“不”字语法化的句法环境	(241)
七、疑问语气助词“不”的语法化机制	(241)
八、“不”字的产生对汉语语法发展的影响	(243)
第三节 疑问句末尾的“无”	(244)
一、引言	(244)
二、疑问句末尾“无”字的用法	(245)
三、唐五代“无”、“也无”、“摩”并存	(247)
四、宋代以后“也无”和“麽”的发展	(251)
五、疑问语气助词“无”的产生	(256)
六、“无”和“不”的相关比较	(257)
第四节 表疑问语气的“婆”	(259)
第八章 事态与尝试态助词	(264)
第一节 事态助词“来”	(264)
一、引言	(264)
二、事态助词“来”的用法	(265)
三、事态助词“来”的演变途径	(271)
四、事态助词“来”的发展	(274)
五、影响“来”演变的因素	(279)
六、“来”语法化的句法环境	(282)

第二节 尝试态助词“看”	(283)
一、引言	(283)
二、尝试态助词“看”的用法	(284)
三、尝试态助词“看”的产生	(287)
四、尝试态助词“看”虚化的前提条件	(289)
五、尝试态助词“看”的发展演变	(291)
第三节 小结	(296)
一、语气助词小结	(296)
二、姚秦译经助词研究小结	(299)
参考文献	(301)
附录一：三秦译经简目	(308)
附录二：引用其他译经简目	(313)
后记	(315)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姚秦译经中的诸语法现象

一、引言

一些学者认为,中古汉语时期指的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但从语言史的角度看,中晚唐时期,白话便已初步形成,因此,它应该属于近代汉语时期。隋历时很短,故不另加考虑,权且划归中古。本书所称中古时期专指魏晋南北朝至隋朝时期,不包括唐代在内。中古汉语和上古(秦汉时期)汉语合称为古代汉语。中古汉语里有不少新的语法形式都来源于上古汉语,同样,近代汉语里的许多新的语法特征萌芽于中古时期。多年的汉语语法史研究,对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取得过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中古时期的语法研究,却只局限于对接近口语的少量本土文献的研究,还没有取得过实质性的突破。

近几年,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古时期的汉译佛经。中古译经的语言在汉语语言研究史上的重要性体现在:它的存在弥补了中古本土文献的不足,为该时期的语言研究提供了充分的资料,使人们了解中古汉语的全貌成为可能。中古译经在中古汉语语法史研究中很有特色,它既有别于汉语传统的任何一种文献语言,也不同于译经原典的语言,具有其独特的个性。根据朱庆之(1993a, 2001)的研究,译经语言是一种非自然产生的独特变体。由于汉语与原典语言成分的结合,以及文言文与口语俗语和不规则成分的结合,其特殊性表现为:在文体上,散文连写和偈颂交替使用;在词汇上,出现大量的音译词;在语体上,采用了一种半文半白的书面语形式,即在文言的基础上夹杂了大量的非文言成分,这当中既有口语的,也有方言的。它所出现的新的语言现象,能帮助我们解决许多目前无法解决,或者仅凭

本土资料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新的语言现象，其产生的条件和发展演变的过程，以及它对汉语历史发展造成的影响，都几乎是全新的课题，有待我们做长期深入的工作。

本书以姚秦时期的译经作为基本材料来研究助词的若干问题，同时，由于三秦时代相近，地域一致，语言特点相互补充，所以兼顾前秦和西秦。前秦，也称苻秦，由氐族人苻健于公元 351 年建立政权，建都长安，灭于 394 年，历时 43 年，所译佛经约占三秦译经总数的 38.5%。西秦，也称乞伏秦，由鲜卑族人乞伏国仁于公元 385 年建立政权，灭于 431 年，历时 46 年，所译佛经约占三秦译经总数的 1.5%。后秦，也称姚秦，由羌族人姚苌于公元 384 年建立政权，建都长安，灭于 417 年，历时 33 年，经文凡 412 万余字，占三秦译经总数的 60%。三秦中，以姚秦译经最多。在语言的实用价值上，所使用的译经材料多数是姚秦译经，其中鸠摩罗什译经口语性强，最具有代表性。一方面以姚秦语料为主，^①另一方面是为了照顾到语料的全面性，于是涉及苻秦和乞伏秦译经，这样会使我们的结论更可靠。之所以把姚秦译经作为基本材料，是因为出于对时间、规模以及语言特点等诸方面的考虑。第一，从时间上看，姚秦译经都出现于公元 384 ~ 417 年，其前，译经的产生已有三个多世纪，其后，直接影响南北朝时期，从中古译经来看，姚秦译经正好处于最中间。第二，从规模上看，可以从数量和范围等方面来体现。数量上，姚秦译经总量为 412 万字，数量适当，既不会因超常规的浩卷而影响工作进程，也不会因数量过少而影响结论的准确性。从译者的范围来看，先有译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的作品，他的作品很有代表性，译经数量占姚秦的 54%，在语法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再有其他人的译作，占 46%，这种比重对语言的分析较为合理。第三，从语言特点上看，在著名的僧人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②的翻译改革的基础上，姚秦译经对原典文在词汇、语义等多方面进行了进一步改革，语言的口语成分很浓，具有较大的实用性。尤其是鸠摩罗什的译经，因为他“祖籍天竺，能晓梵文”，在凉州生活 16 年，接触汉地文化，“善方言”，后来久处长

① 因为姚秦的译经数量最多，姚秦鸠摩罗什译经的影响最大，因此我们以姚秦译经作为标题。

② 道安法师：《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第一》，见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八。

安。译经时，常“手执胡文，口自宣译”，“两释异音，交辩文旨”，“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按：梵文）；秦名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①加之又有学识渊博、富有文才的僧睿、道融、昙影、僧肇等弟子的协助，译经时文质结合，所译佛经在内容的表达和词语的应用等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在中国译经翻译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后人将他的译经誉为“新译”（在他之前的译经统称为“旧译”）。另外，从影响看，过去翻译佛经皆由民间分散进行，姚秦以来，由于统治阶级的重视，从鸠摩罗什开始，佛经正式被作为封建国家的宗教文化事业来建设，国家创立僧尼管理机构，提供资金，组织人力，从事译经翻译，这使佛经得以迅速传播。当时参与鸠摩罗什译经的弟子达 500 人之多，跟从他受学听法的弟子多至 3000 人。该时期所译的佛教典籍，对中国佛教的宗教哲学和教义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后来中国佛教学派和宗派所依据的重要经典，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翻译成汉文的佛经。

为讨论该时期译经语言的语法现象，先有必要对姚秦译经的数量、年代和它的真实性作些说明。

二、姚秦译经的数量、年代及真实性

（一）姚秦译经的数量

截至目前为止，收录最丰富的汉文大藏经是总共分为 100 巨册的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藏》）的前 55 册正编（其后 45 册续编主要收录日本撰述和目录图像）。据编者统计，姚秦译经 88 部，593 卷，但是据吕澂（1981）统计，应为 73 部，761 卷，约 690 万字。其具体情况如下：^②

苻秦（351～394）

昙摩难提	2 部	62 卷	53.2 万字
僧伽跋澄等	5 部	58 卷	49 万字
竺佛念	7 部	82 卷	69.8 万字
鸠摩罗佛提	1 部	2 卷	1.7 万字
僧伽提婆共竺佛念	1 部	30 卷	26.6 万字

姚秦（384～417）

① 长安释僧祐：《小品经序第二》，见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八。

② 吕澂（1981）认为是“附秦录”的译经数量不多，本文暂未统计。

鸠摩罗什	39 部	403 卷	381.3 万字
佛陀耶舍	3 部	23 卷	19 万字
昙摩耶舍	1 部	1 卷	0.83 万字
昙摩婢共竺佛念	1 部	5 卷	4.2 万字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	1 部	61 卷	50.6 万字
昙摩耶舍共昙摩崛多	1 部	22 卷	18.3 万字

乞伏秦 (385 ~ 431)

圣坚	8 部	10 卷	8.3 万字
法坚	3 部	3 卷	2.5 万字

在这些译经中,经、律二藏占绝大多数,它们是汉文译经语言史料价值最高的部分,为断代研究提供了全面而可信的材料。在这方面,荷兰学者许理和(E. Zürcher 1987)曾作过有益的尝试。他对东汉29部译经作品中的口语成分进行过专门的探讨,得出了可靠的结论,总结概括出公元2世纪洛阳口语的概貌。利用姚秦译经的可靠材料,也可同样窥探到该时期语言的基本状况。

(二) 姚秦译经的年代

该时期译经有的译者和译作年代可以确定,但有的译者和译作年代却不能确定。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情况:

1. 译者和译作的年代都确定。如:

富楼那会,3卷,原保富楼那问经,鸠摩罗什译[祐],^①弘始七年(405)出[房]。

华道经,10卷,鸠摩罗什译[祐],弘始八年(406)出[房],后题华手经[开]。

菩萨瓔珞经,12卷,竺佛念译[祐],建元十二年(376)出[房]。

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5卷,昙摩婢共竺佛念译,建元十八年(382)出[祐]。

增壹阿含经,51卷,昙摩难提译,建元二十一年(385)出。

长阿含经,22卷,佛驮耶舍译,弘始十五年(413)出。

2. 译者确定,译作年代不确定。如:

阿难分别经,1卷,法坚译[经]。

^① “[]”中的“祐”、“房”、“经”、“开”分别指梁僧祐《出三藏记集》、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隋法经等《众经目录》、唐智升《开元释教录》。

十诵比丘戒本, 1 卷, 鸠摩罗什译 [祐]。

昙无德戒本, 1 卷, 佛陀耶舍译 [祐], 后题四分僧戒本 [开]。

中阴经, 2 卷, 竺佛念译 [祐]。

3. 译作大致时代确定, 译者不确定。如:

普明菩萨会, 1 卷, 原保大宝积经, 失译, 姚秦录 [开]。

大方广如来秘密藏经, 1 卷, 失译 [经], 姚秦录 [开]。

出家功德经, 1 卷, 失译, 姚秦录 [开]。

净业障经, 1 卷, 失译, 姚秦录 [开]。

在以上三种情形中, 第一种最可靠。第二种虽然没有确定的年代, 但可以根据译者的生活情况来推测译作的大致年代。第三种虽然不能确定译者的时间, 但知其朝代。考察姚秦的译作, 一般说来, 只要能确定作品为该时期范围内, 就可以作为语言研究的材料。由此可见, 上面三种情形是我们进行研究的可靠材料。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有一些译经的译者和年代目前尚无从考证, 所以没有收入我们的考察范围。据吕澂 (1981) 的考证, 这类“失译”的译经大约有 200 部。

(三) 译经的真实性

目前最常见的本子 1934 年印成的日本《大正藏》(正在编辑的《中华大藏经》暂当别论), 它以《高丽藏》再雕本为底本, 以宋、元、明三藏和官本、圣语藏、敦煌写本、古佚本补充校正。从校勘记中, 可以看到《大正藏》的失误之处: 在文字方面, 有形近误和音近误, 文字增减; 在词语方面, 用同义词替代和用时髦词替代等等。这些讹误虽然不影响大局, 但也需要在使用的过程中进行严格的校对。

三、姚秦译经中的诸语法现象

只有确定了译经语言材料的真实性之后, 方能研究该语言的语法现象。大体来说, 姚秦译经出现了以下一些很有特色的语法现象。

(一) 一些语言结构不合汉语正常语序

译经所据原经均为印欧语, 主要是梵语 (Sanskrit), 早期可能还有俗语 (Prakrit)、巴利语 (Pali)、伊朗语等等 (季羨林 1985)。这些语言都是屈折语 (inflected language), 它是一种词干屈折语 (stem-inflected), 句法关系是通过附着在词干上表示不同语法范畴的后缀所表示的。任何充当句子成分的词, 除了词干所表示的词汇意义以外, 还有曲折词缀所表示的语法意义, 它们结合起来构成该词在句子中的实际意义, 这与孤立语, 如主要通过词序和虚词来表示句法关系的汉

语是完全不同的。而翻译多采取逐字逐句对译的方式，这必然形成译经中因模仿印欧语而不合汉语语序的语言。如：

- (1) 又见菩萨，肴膳饮食，百种汤药，施佛及僧。(《妙法莲华经》，9/3c)^①

bodhisatvo mahāsatvo khādyañca bhojyañca tathānnapānaṃ

菩萨 大菩萨 肴膳 食 饮食

gilānabhaisajya bohūanalpakam^② vastrāṇa koṭīṣata te dadanti

汤药 许多 衣服 无数 施

(译文：菩萨把无数肴膳饮食、汤药、衣服施及给佛。)

“肴膳饮食，百种汤药”这一宾语到了谓语之前，依汉语的习惯当放在谓语动词“施”的后面。它是受梵语的所谓 III 型语言的影响 (Greenberg 1966)，即梵文 SOV 语序的硬译。像这种不合汉语语序的句子格式还有呼格，即呼语。如：

- (2) 佛言：如是微妙希有之法，阿难，甚奇，甚特，未曾有也。唯有如来能成此法。(《长阿含经》，1/16b)

- (3) 世尊告言：善哉，善哉，族姓子，是汝所应，以信出家，乐清净行。(《四分律》，22/591c)

例 (2) “阿难，甚奇，甚特”这一插入语放到了引文的中间，依汉语的习惯当作“佛告阿难言：甚奇，甚特，如是微妙希有之法，未曾有也”。例 (3) “族姓子”这一插入语也放到了引文中间，依汉语的习惯，当作“世尊告族姓子言：善哉，善哉，是汝所应，以信出家，乐清净行”。(朱庆之 2001) 它是由梵语的所谓“八转声”中的呼格 (purusa) 对译过来的。^③“呼格”意思是“呼叫之声”。在译经翻译中，某些语法形式，如梵语名词 (或代词、形容词、数词) 的八种格的变化，会影响汉语的语序或词序。例如梵文语法规则规定，十以下的数字放在名词前面，十以上的数字却在名词后面。“眷属八万人”

① 本书所用的译经均来自于 1934 年日本的《大正新修大藏经》，所有标点是作者所加。因《大正藏经》本无标点，已经点校出版的译经因各人理解的不同，标点有所不同。而本书重在研究译经中的助词，不重经文的意义理解，故以本人的粗略理解标记标点，错误之处均由作者负责，不当之处谨致歉意。括号里标有“/”前后的数字分别指《大正藏经》的册数和页数，“a、b、c”分别指页数的上中下栏。属于三秦时期以外译者的姓名的都标示出来，三秦译者的姓名参见附录一。

② 梵文引自蒋忠新：《梵文写本〈妙法莲华经〉》，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年版。

③ 法藏 (643~712)：《华严经探玄记》卷第三，《大正藏》，35/194a。

(《妙法莲华经》卷一),就是梵语语序的直接翻译。梵文“mahāsthāmaprāptena”,鸠摩罗什译的词序是“大势至菩萨”(《妙法莲华经》卷一),是直译,而竺法护译的词序“得大势菩萨”(《正法华经》卷一),则为意译。可见梵文翻译对译经语序的影响。

(二) 中古本土文献未曾见的新句式

1. 新产生“将”字等处置式句型。

自从王力(1958)提出“处置式”半个多世纪以来,处置式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对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处置式注意得多一些,对古代汉语处置式的研究还不够。在姚秦译经中,有一些广义和狭义处置式的用法,这里作些简单的介绍。(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侧重讨论处置式的结构,用例中所涉及的词,有的还可能是次动词。)

“将 + O₁ + V + O₂”:

- (1) 时左右人即将彼贼付刑人者。(《长阿含经》, 1/43b)
- (2) 若出家学道者,便成佛道,我今可将此女与彼沙门。(《增壹阿含经》, 2/769b)

“将 + O + V + Y”:

- (3) 诸夫人女自生念言:我等不宜将此宝物还于官中,若王于东方设大祀时,当用佐助。(《长阿含经》, 1/100a)

“将 + V + Y”:

- (4) 时巴树提亦集四兵共其鬪战。娑罗那军悉皆破坏,擒娑罗那,拘执将去。巴树提言:此是恶人,可将杀去。(《大庄严论经》, 4/326a)

“将 + O (+ X) + V + 之”:

- (5) 我敕左右,将此人以称称之。(《长阿含经》, 1/44c)
- (6) 汝将此人安徐杀之,勿损皮肉。(《长阿含经》, 1/45c)

“将”字已经出现了四种类型,其中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情况。广义处置,如例(1)、(2)是处置(给),例(3)是处置(到)。狭义处置如例(4)、(5)、(6)。例(6),根据文义,此人已在施事者的控制之中,不需要“捉拿”这一动作过程,是狭义处置式。此期,个别的用例里,“将”字已经虚化,接近处置式。祝敏彻(1957)、王力(1958)认为,初期处置式的动词一般是一个单音节或双音节的单纯动词,就“将”字处置式初期情况看,这一结论得到了验证。但是他们把处置句式的演变过程概括为由简单到复杂,这与我们在译经中调